

汉王朝与汉文化走向世界的考古学解读

时 间：2014 年 1 月 11 日

地 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白云翔

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兴到国博讲堂来跟各位见面，交流关于考古学研究的体会。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汉王朝与汉文化走向世界的考古学解读”。首先有一个引言，说明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然后分五个部分来讲，谈谈汉王朝和汉文化从考古学上来看是怎样走向世界的；最后有一个简单的结束语。

引 言

在人类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不仅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我们国家人类的起源是在大约两百万年前，但就文明史而言，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从文化交流来讲，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乃至史前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集团之间的交流是在逐渐发展的，比如我国古代冶金术的起源、小麦的种植等，都可能与中亚、西亚地区有关，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和周边地区就发生了交流。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向周边地区传播，比如，我们的近邻朝鲜半岛就曾发现了战国时期燕国的铁器和铜器，在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铜镜等。当然，先秦时期的文化交流应该还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流。

公元前 221 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外文化交流从秦代开始表现为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流。但秦王朝是短命的，秦王朝统治中国只有短短的十五年，后来被汉王朝所取代。汉王朝统治时期，即公元前 206 年至 220 年，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也是中外交流的第一

个高潮时期。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国家，古代中国真正地同国外发生交流和交往是从汉代开始的。

当然，交往也好，交流也罢，一般来说都是双向的，不可能单向地发生交流和交往，这就出现了一个文化的“引进来”和“走出去”这样两种现象。这是在学习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但是，不同的时代主次有所不同。我们这些年的研究发现，两汉时期的四百多年时间，应该说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旋律是走出去。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主题。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两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同研究整个古代史一样，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文献史学，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古代文献非常发达，对古代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对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多的文献记载。汉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也有一定的文献记载，比如《史记·大宛列传》里讲到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

但是我们也知道，文献记载有它的局限性，很多的历史事件、历史文化现象不可能记述得那么具体和详细，况且文献记载本身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这就提出了考古学的问题。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可以上溯到1928年殷墟的发掘等考古活动。考古学的基本性质和任务，是根据地下发掘出来的各种遗迹和遗物，通过考古学的方法并结合文献史料以及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古代社会。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逐渐成为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大家知道，1925年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此后，考古学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结合就成为古代史研究的最佳途径和方法。

我们对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是采用了以考古学材料为主并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夏鼐先生等就开辟了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途径。根据考古资料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物品（或者说文物）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的传播并不仅仅是一种物品的传播，而是人员往来和人群移动的结果，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物品传播的过程中，与之相伴随的是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交流。

在根据考古资料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时候，会遇到一个中国境内和境外的的问题。中国境内发现的两汉时期外来的文物，不管是中亚、西亚的还是其他地区的，都是汉代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在这方面有不少的研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境外发现的汉代的文物或者说汉朝的器物，同样是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见



图一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银盒

证。从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来讲，境外发现的材料更为直接、更为关键。

我们国家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视野长期被限定在中国境内，因此中国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外来的文物，或者有关的一些文化现象。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考古学界、史学界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外来文物的研究比较深入。

譬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图一），类似的器物在山东、安徽和其他地方也有出土，据研究是从西亚地区传来的，也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西亚的影响由中国工匠制造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学科发展的制约，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境外发现的汉朝文物或有关汉文化的遗迹和文物，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研究的人少，资料掌握得少，成果也非常少，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误解或者叫作误读，就是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旋律是引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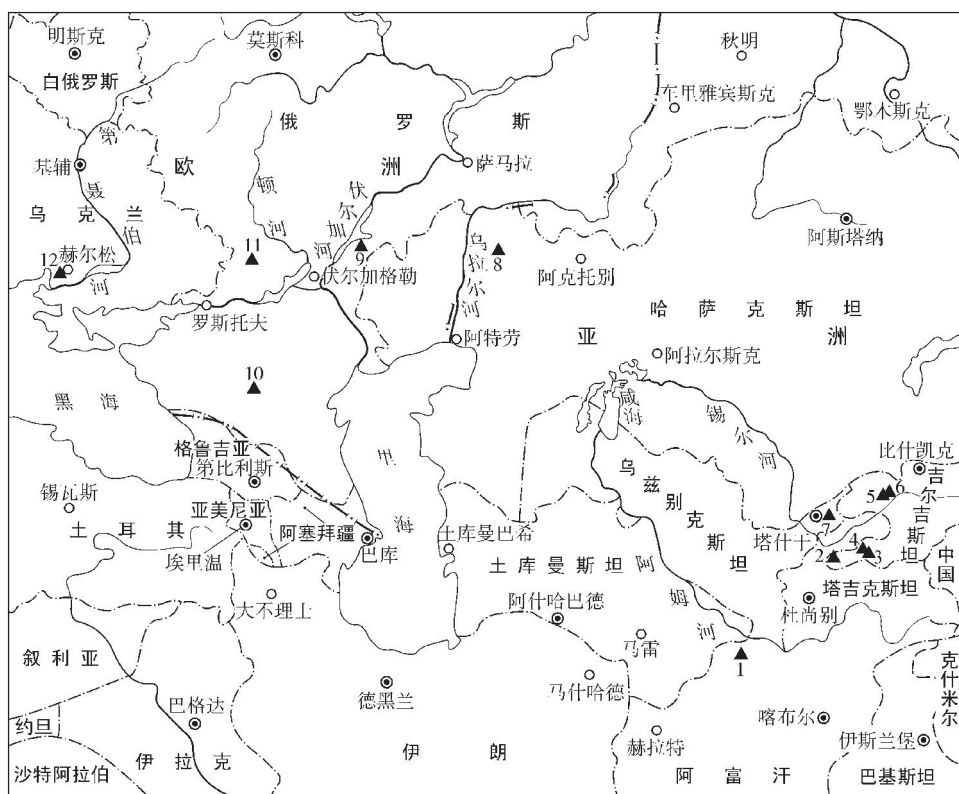
实际上，我们通过最近十几年的考古学研究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汉代的四百多年间，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旋律是走出去。今天，我们就通过国外发现的汉代文物和相关器物来说明这样一段史实：汉王朝和汉文化是如何走出去的，即如何走向世界的。

一、走向中亚、西亚及欧洲

从我国向西是广阔的中亚地区，1991 年以前，它们属于前苏联的中亚地区，现在属于各自独立的中亚五国。从中亚往西、往南是西亚地区，再往西就到了地中海沿岸。汉代通往中亚、西亚的道路，是从长安出发，经过陇东地区往西，穿过河西走廊，从敦煌再往西；或者走北路，从敦煌到哈密，通过天山北麓往西，到达现在的哈萨克斯坦；或者从哈密往南，沿天山南麓往西南，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现在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即当时的西域。需要说明的是，汉代的“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西域是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广义西域则包括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广阔的中亚地区。

就有关的考古发现来说，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在整个中亚、西亚和

欧洲东南部地区，发现汉代文物或者说汉式器物的地点有二十多处（图二）。这些地点中，有两个地点特别值得关注。



图二 中亚、西亚及欧洲汉代文物出土地点(部分)分布示意图

一个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北的蒂利亚山墓地（图二中的1），1978～1979年间，苏联学者和阿富汗学者共同对这个墓地进行了发掘，发掘了六座墓葬，都是当时的贵族墓，年代大概是公元前1世纪到1世纪。这六座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包括各种金银器。其中的2、3、4号墓，墓主人身上穿有丝绸衣服，随葬品里有汉代的铜镜（图三）。

另一个是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列别杰夫卡墓地（图二中的8），1977～1979年间，苏联学者在这里发掘了八十八座墓葬，分属于八个墓区。在这个墓地中，5号墓区23号墓堆的2号墓和39号墓堆的2号墓分别出土了汉代的铜镜。墓葬的年代大致是公元2世纪到3世纪，是当时萨尔马泰族的文化遗存。

上述两处墓地之外，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沙漠中的帕尔米拉城址也很重要。帕尔米拉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商业性城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汉代绢的残片，有的上面还有汉字，它的年代是公元前1世纪到3世纪。

中亚、西亚和欧洲东南部地区发现的汉代文物主要有四大类：一类是丝织品，一类是漆器，一类是钱币，一类是铜镜。丝织品无疑是从汉朝传过去的，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多处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发现。漆器无疑也是从汉朝传过去的，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的贝格拉姆都城址等地都发现有漆器残片。但是，由于当时发掘条件和水平的限制，这些丝织品和漆器没有能够有效地保存下来，也没有完整地记录和公布出来，因此，我们现在只是知道哪些地点发现过丝织品和漆器，但具体情况并不了解。钱币也有不少发现，如费尔干纳盆地多处发现有五铢钱，包括西汉五铢钱和东汉五铢钱，但尚未看到系统的整理和详细的资料。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来说，发现最多、保存比较好的汉代文物是铜镜。

中亚、西亚及欧洲东南部发现的汉代铜镜，种类多样，常见的有连弧纹铭带镜、四乳四虺纹镜、方格博局纹镜、云雷连弧纹镜和直行铭文夔凤镜等。这里结合图片举例加以说明。

首先看连弧纹铭带镜。这种铜镜突出的特点是铜镜背面装饰有内向连弧纹带和铭文圈带，但它们的大小、细部花纹和铭文等多有不同。阿富汗蒂利亚山墓地发现的三件汉镜都是这种铜镜，其中2号墓出土的铜镜（图三），直径17.8厘米，有三十四字铭文，释读为：“心污结而挹愁，明知非而可久，□所不能已，君忘忘而矢志兮。爱使心央者，其不可尽行。”这类铜镜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黑海西北岸等地多有发现，在我国流行于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

还有一种连弧纹铭带镜，镜体较小，铭文是简单的八字铭文。这一件是俄罗斯南部顿河下游维诺古拉多夫墓地发现的连弧纹铭带镜（图四），直径7.4厘米，



图三 阿富汗蒂利亚山2号墓出土铜镜



图四 俄罗斯维诺古拉多夫墓地出土铜镜

铭文是“见日之光，长勿相忘”。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河下游的斯塔拉雅·保尔塔夫卡墓地也出土有类似的铜镜，但它的铭文是“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这种铜镜在我国的汉墓中也有大量出土，应当是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的产品。

四乳四虺纹镜，它的突出特征是铜镜背面装饰有四个乳钉和四个“S”形的虺龙纹。这种铜镜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卡拉布拉克墓地、俄罗斯西南部顿河下游的科比亚科夫墓地以及黑海北岸的赫尔松市郊都有发现。这种铜镜的流行年代是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

方格博局纹镜，是西汉晚期出现的一种铜镜，流行于新莽和东汉时期。它的特征是铜镜背面装饰有一个方格框和博局纹，又叫规矩纹，但细部花纹多有变化。这一件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卡伊拉加奇墓地出土的方格博局纹镜的残片（图五：左），钮的周围有一个双线方格框，主纹区装饰双线凹面“TLV”纹、圆座乳钉以及细线有角动物和枝蔓等，镜缘中部有一周双线波折纹带，直径 11.8 厘米。这种铜镜的残片在哈萨克斯坦的列别杰夫卡墓地、吉尔吉斯斯坦的卡拉·特克梯尔墓地（图五：右）等地也有发现。



图五 吉尔吉斯斯坦卡伊拉加奇墓地(左)、卡拉·特克梯尔墓地(右)出土铜镜

另外一种常见的铜镜是云雷连弧纹镜，它的特征是铜镜背面装饰有内向连弧纹带和云雷纹带，但有的云雷纹带比较简化，流行年代是东汉时期。这一件是吉尔吉斯斯坦卡拉布拉克墓地出土的铜镜（图六：左），环绕钮座有一周栉齿纹带和一周凸弦纹带，内区为八个内向连弧纹，外区为两周栉齿纹带和云雷纹带。类似的铜镜在哈萨克斯坦的列别杰夫卡墓地、吉尔吉斯斯坦的卡拉·特克梯尔墓地（图六：右）、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附近等地也有出土，直径 8~15 厘米不等。过去有的前苏联学



图六 吉尔吉斯斯坦卡拉布拉克墓地(左)、卡拉·特克梯尔墓地(右)出土铜镜



图七 吉尔吉斯斯坦杰尔·阿雷克墓地出土铜镜

者认为,这种铜镜不是汉镜,而是仿汉镜,但最近这些年在西安、河南等地发现了与之非常相近的铜镜,因此我们认为这种铜镜不是仿汉镜,应该是汉镜。

还有一种铜镜是直行铭文夔凤镜,它的流行年代是东汉中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杰尔·阿雷克墓地出土一件(图七),半球形钮,圆圈钮座,镜钮上下为直行铭文“位至三公”,铭文外侧为栉齿纹框,铭文框两侧为对称的图案化夔凤纹,外侧有一周斜线栉齿纹带,直径8厘米。这种铜镜,目前在中亚地区仅出土这一例。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亚、西亚及欧洲发现的汉代铜镜,年代最早的是西汉中期,最晚的可以到东汉晚期,分布区域从中亚五国一直到欧洲东南部,也就是里海和黑海的北部沿岸地区。那么,如何理解这些铜镜的发现?如何从这些铜镜看汉王朝和汉文化的扩展呢?

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与张骞出使西域有关。大家知道,张骞出使西域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前后,主要是为了联络大月氏来抗击匈奴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出使的,但是由于当时的匈奴很强盛,出使以后很快被匈奴扣留了,扣留了十多年之后寻机逃出,历尽艰辛逃到了大宛国,此后被送到康居,后来辗转到了大月氏和大夏,又经历了被匈奴再次扣留并再次逃脱,最后绕道南山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了长安。这幅壁画是敦煌石窟里所描绘的张骞出使西域的场景(图八)。由于是石窟寺佛教壁画,它跟张骞出使西域不能完全对应起来,但是可以看到在唐代初年,人们对张骞出使西域已经有很深的认识。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到了什么地方呢?大宛国,地当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北部的



图八 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张骞出使西域图”(初唐)

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地当今锡尔河与阿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大月氏，当时控制着阿穆河两岸的原大夏国的部分领土；大夏是在大月氏进入该地区之前阿穆河流域的一个古国。目前汉代铜镜集中发现的区域之一，就集中在中亚的上述地带。

然而，这些地区发现的汉镜，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似乎关系不大。因为，从文献记载来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并不顺利，甚至是很狼狈的，出使不久就被匈奴扣留了，十多年以后才逃脱，逃脱的时候带着大量的东西是不太可能的。另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离开大宛时曾向大宛国王许诺：“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因此，中亚地区发现的汉镜，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没有直接关系，但与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有关。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或稍后，为了联络乌孙，张骞率使团从长安出发，第二次出使西域。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张骞这次出使西域有两个特点：一是人多，并携带大量资财，即文献所记的“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二是带有多名副使，联络乌孙的同时还联系其他诸国，即文献记载的“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张骞出使期间，“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扞犂及诸旁国”。到了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归汉朝时，乌孙曾派遣使者数十人相送，“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此后，“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由此，汉王朝建立起了同西域诸国的正式联系，绿洲丝绸之路就完全开辟了，这就是所谓的“凿空”。又据《史记·大宛列

传》记载：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从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来看，中亚地区发现的西汉中期的铜镜、钱币、丝绸和漆器等，应该主要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以及后来出使西域的使团带过去的，并且数量十分可观。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宛国饶汉物”，也就是大宛国里到处可以见到汉朝的物产，可以想见当时汉王朝和中亚地区诸国积极交流的盛况。这样看来，大宛国及其附近诸国所在的中亚地区发现大量汉代的铜镜以及钱币、丝绸和漆器等，就不足为怪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腹地之外，在亚洲西北部和欧洲东南部的乌拉尔河、伏尔加河、顿河以及第聂伯河流域，也就是咸海、里海和黑海沿岸及其以北地区也发现了不少的汉代铜镜。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些地区的发现呢？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余太山先生认为：《史记》所载之奄蔡，是萨尔马泰人东部的一支，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咸海和里海以北，“大泽”应该是指今咸海，北海指的是今咸海或里海。但是，历史文献中并没有见到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期间他的副使远至里海北岸的记载，也未见后来的汉朝使团到达这一地区的记载。很显然，这些地区发现的汉代铜镜等文物，是以其他方式传播过去的。至于传播路线，推测应该有两条：一条路线可能是通过绿洲丝绸之路的“西北迂回支线”，即从大宛（费尔干纳盆地）出发向西，再沿锡尔河低地向西北到达咸海，然后沿里海北岸的草原地带向西到达黑海沿岸乃至更远的地方；另一条路线可能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即穿过河西走廊，经由哈密、吐鲁番、吉木萨尔、伊宁等地沿天山山脉北麓向西，沿咸海北岸和里海北岸的草原地带向西直至黑海北岸一带。

今天要特别说明的是，讲到丝绸之路的时候，过去经常有人认为是商贸之路。这是一种误读。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来看，丝绸之路的开辟最初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为什么呢？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为了联络大月氏，以便与之结为同盟，共同对付匈奴；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直接目的，更是为了联络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同时也是为了联络乌孙周围的西域诸国。因此，丝绸之路的最初开辟，其动因其实不是为了经贸，也不是为了文化交流，而是为了抗击匈奴，因此它最初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当然，随着使团往来的增加和商贸的发展，后来成了一条商贸之路。与此同时，随着人员的往来和物品的

流通，又成为一条文化交流之路。

有的学者认为，物品的传播是人员交往的结果，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不能完全画等号，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汉朝的物产传到了中亚、西亚和欧洲南部地区，其实不仅仅是人员的交往，也不仅仅是物产的传播，而是随之而来的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

就拿铜镜来说，不仅仅是汉王朝的铜镜传到了这个地区，而且是由于汉朝铜镜的西传，导致当地开始了汉式镜的制作。从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是四乳波折纹镜（图九），是汉代铜镜中所不见的。这样的铜镜还有不少，貌似汉镜，但细看又不是汉朝制作的铜镜，实际上，它们是在汉镜文化的影响下，在当地制作的汉式镜，显然是当地接受了汉文化的产物。

我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呢？因为，中亚地区传统的铜镜形制是一个圆板一侧带一个把儿，称之为“带柄镜”，而这种圆板式的、背后中央有一个钮儿的铜镜，是中国的特色。尽管这种判断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证实，包括这些铜镜是汉朝来的人铸造的还是当地人铸造的、使用的是陶范铸镜技术还是石范铸镜技术等问题，目前还无法考证清楚，但这种铜镜的发现向我们证明了：汉王朝时期，随着人员的交流和物品的传入，汉文化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中亚地区并被当地所接受。当然，这种仿制的汉式镜在欧洲南部地区还没有发现，所以汉文化的影响是否已经远及欧洲南部地区，尚不明了。

二、走向蒙古-西伯利亚

接下来我们看汉王朝及汉文化向北的扩展，也就是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扩展。

长城以北，是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由我国的北疆再往北就是蒙古高原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这个地区在先秦时期主要是古代文献中所说的胡人的活动区域，主要是东胡和月氏等部族活动的地域。但是到了战国晚期，也就是进入公



图九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地区出土铜镜

元前3世纪以后,匈奴逐渐强盛起来,在匈奴最强盛的时期,它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南起阴山、北到贝加尔湖、东至辽河、西达葱岭的广阔地域,今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国都是匈奴文化遗存集中发现的地区。因此,汉王朝和汉文化向北扩展是在汉匈博弈过程中发生的。

根据目前可以搜集到的材料,在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汉代文物的地点也有二十多处(图一〇),其中有城址、聚落遗址,但更多的是墓葬遗存。譬如,位于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哈卡斯共和国首府阿巴坎市以南8公里处的台基式建筑基址(图一〇中的2),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6米、东西宽约24米,由中央大殿和环绕四周的小房间组成。中央大殿呈方形,大殿四周有19个小房间。据复原研究,整个建筑为四阿式重檐建筑,屋顶用瓦覆盖,房檐有圆形瓦当。出土遗物中与汉文化有关的遗物是圆瓦当、铜铺首和玉耳杯等。瓦当四周有边轮,当面有竖向阳文反书汉字“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图一一:1)。这种瓦当不是从汉朝传过去的,而是汉朝的工匠为了修建宫殿建筑在当地制作的。铺首为有角人面形象,张目、兽形双耳和双角,头顶为山字形鬃毛,高鼻衔环(图一一:2),是建筑物门扉上的饰件。它们都具有汉器风格,



图一〇 蒙古和南西伯利亚地区汉代文物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

但并非汉朝境内所产，而是仿照汉器在当地制作的汉式器物，与整个宫殿在当地建造而具有汉式风格是一样的。关于这处建筑的性质和用途，前苏联学者推测为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投降匈奴后的宅邸；中国学者多认为可能是王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的居所。我个人倾向于这



图一— 南西伯利亚阿巴坎汉式宫殿建筑遗址发现的瓦当及铺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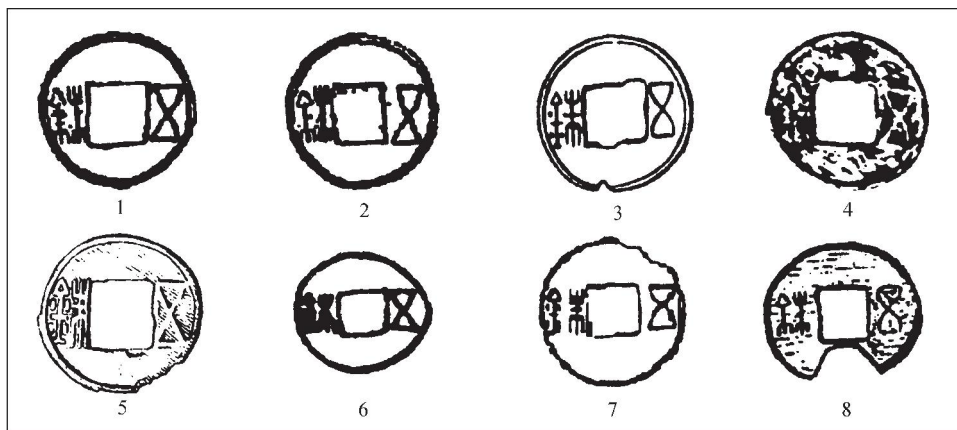
处建筑可能与王昭君出塞有关，因为从出土遗物看，它的年代到不了西汉中期，而是属于西汉晚期或新莽时期。阿巴坎汉式宫殿建筑，无论是李陵的宅邸还是王昭君长女的住所，它都是汉朝工匠来到这一地区并模仿汉式建筑而建造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在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地区，与汉文化联系更为直接、更多的考古发现还是各种汉代文物，包括钱币、铜镜、铜器皿、铁器、玉器、漆器以及丝织品等，下面分类作简要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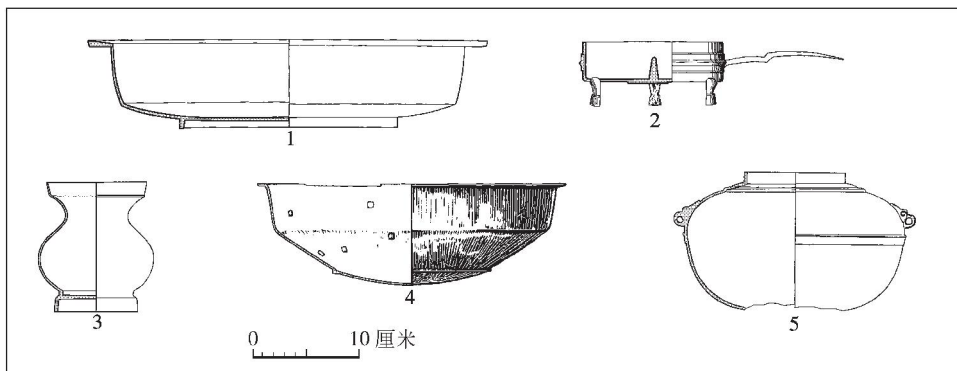
钱币曾发现于外贝加尔地区的伊沃尔加墓地、德列斯图依墓地以及蒙古国的苏勒比乌拉墓地，种类有五铢钱和新莽时期的货泉等。其中，伊沃尔加墓地出土的五铢钱具有鲜明的汉武帝时期的特征（图一二），其他墓地发现的五铢钱有的是东汉五铢。

铜镜是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地区最常见的汉代文物，都出于墓葬中。铜镜的种类很多，有西汉初年的涡卷纹地连弧纹镜、花叶禽鸟纹镜、蟠螭纹镜，西汉中期及其以后的草叶纹镜、星云纹镜、四乳四神镜、四乳四虺纹镜、四乳鸟兽纹镜、连弧纹铭带镜、多乳禽兽镜、博局纹镜、云雷连弧纹镜，还有东汉晚期的环状乳神兽镜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发现的汉代铜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是残片，迄今未见一件完整的，可能与当地用破镜随葬的丧葬习俗有关。

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汉代铜制品中，还有铜器皿和铜车马器。譬如，蒙古国诺因乌拉匈奴墓曾出土铜盆、铜盘、铜釜、铜盂、铜行灯（图一三）



图一二 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出土五铢钱
(4、5出自伊沃尔加,其余出自德列斯图依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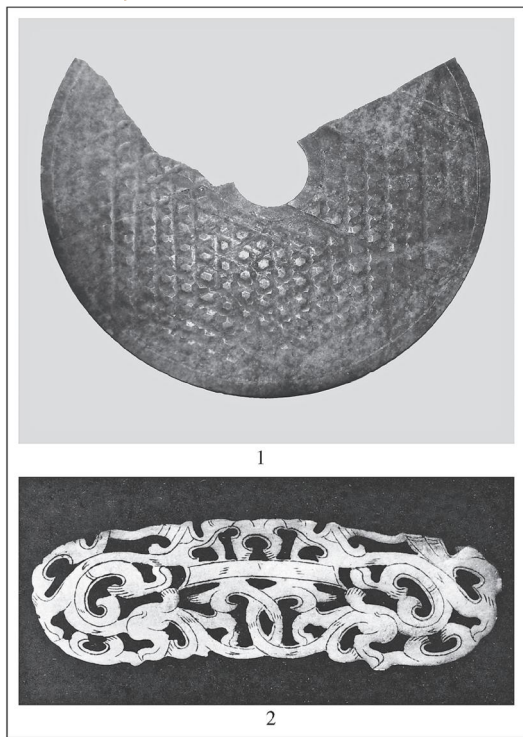


图一三 蒙古国和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出土铜器
1. 盘 2. 行灯 3. 盂 4. 盆 5. 釜
(4出土于俄罗斯伊沃尔加城址,其余出土于蒙古国诺因乌拉墓地)

等；高勒毛都 20 号墓出土一件铜鼎的残片；外贝加尔地区伊沃尔加发现有铜盆等。这样的铜器皿在我国境内的汉墓中常有发现，有的甚至完全一样。铜车马器，在诺因乌拉匈奴墓、高勒毛都匈奴墓等地发现有铜车吏、当卢和盖弓帽等，其中的铜盖弓帽与汉墓中的同类器物别无二致，显然是从汉朝传过去的。

铁器也有不少发现，如俄罗斯伊沃尔加城址出土的铁镰刀、凹口锄和犁铧等，都是汉代常见并且具有代表性的铁器。

玉器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墓中也有发现，种类有玉佩、玉人、玉璧、玉璜及其他装饰品等。如画面所示，蒙古国都尔利格纳尔斯 2 号墓出土的谷粒纹青玉璧



图一四 蒙古国出土玉器
1. 都尔利格纳尔斯基地出土玉璧 2. 诺音乌拉墓地出土玉佩



图一五 蒙古国诺因乌拉6号墓出土“上林”漆耳杯

(图一四：1)、诺因乌拉12号墓出土的双龙纹白玉佩(图一四：2)，在西汉诸侯王墓中都有所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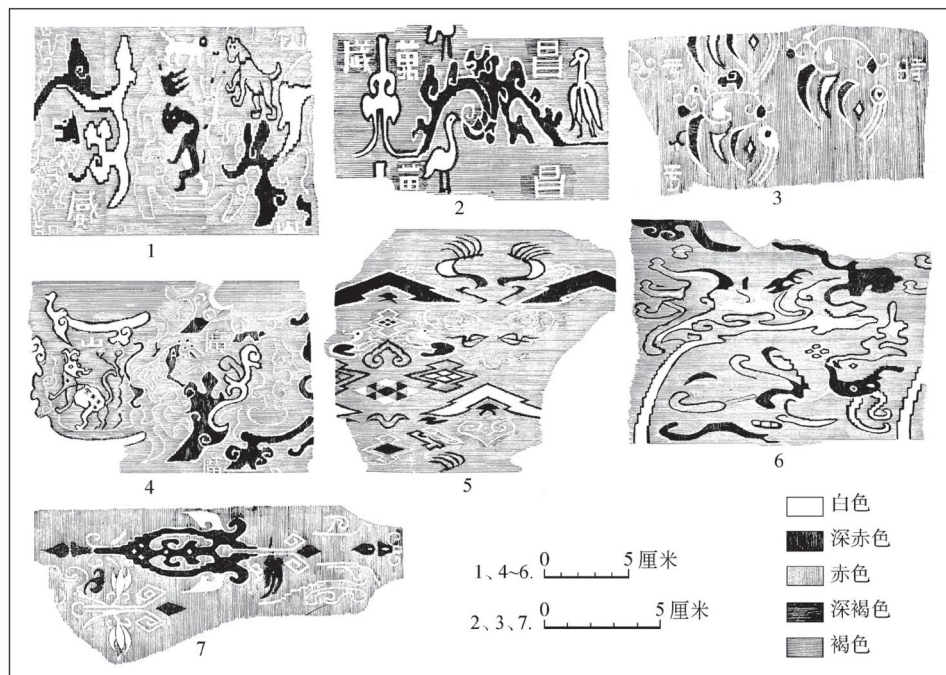
漆器也多有发现，但保存状况一般不佳。蒙古国诺因乌拉墓地出土有漆耳杯、漆盘、漆奁以及漆兽形尊等，其中6号墓出土的一件漆耳杯的底部朱书“上林”二字(图一五)，圈足外侧针刻“建平五年九月……”的铭文，由此可知它的制作年代是建平五年，即公元前2年；5号墓出土的一件漆耳杯的圈足外侧针刻有“建平五年蜀郡西工造……”的铭文，由此可知它是设在成都的蜀郡西工的产品。很显然，这些漆器无疑是从汉朝传过去的，并且根据铭文可以确切地知道它们的制作年代及产地。

除了上述各类文物之外，还发现了大量的丝织品的残片。丝织品一般保存不是太好，只有诺因乌拉墓地的保存比较好并且有详细的报告，主要有绢、织锦、绶、纱和刺绣等(图一六)。丝织品的图案是汉朝的，还有“繁昌万岁”等汉字，它们无疑是来自汉朝的物产。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汉代文物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非常齐全，同类文物在我国境内的汉墓中几乎都有发现。那么，如何来理解和认识这些文物在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发现呢？

应当指出的是，汉王朝和汉文化的向北扩展，与向中亚西亚地区的扩展有所不同，实际上是在汉匈博弈的过程中实现的。就向北扩展的途径来说，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种途径是争战。一讲到匈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汉匈战争。的确，在匈



图一六 蒙古国诺因乌拉墓地出土织锦残片

匈奴侵、秦汉王朝守卫北疆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汉匈战争，是秦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秦王朝时期，秦始皇就曾派蒙恬率十万大军北击匈奴，以巩固北疆边防。到了汉代，汉王朝从西汉初年开始就反复多次跟匈奴作战，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在匈奴南侵和汉匈争战过程中，一种情况是匈奴自汉朝北疆掳掠大量的人员和财物，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大举南侵，“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另一种情况是有的汉将被打败以后投降了匈奴，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战败而降匈奴，并且“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也就是匈奴单于敬重李陵，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为妻。另外，在汉匈争战过程中，北部边疆地区的民众由于受战乱的影响，经常有人逃到匈奴地区，正如《汉书·匈奴传》所载，“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时有亡出塞者”。在这个过程中，匈奴不断地劫掠边民的财物，投降匈奴和流亡到匈奴的人也会带去财物，于是大量汉朝物产不断流入匈奴。战争很残酷，也是我们反对的，但是在战争过程中，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又是一种伴生的东西。

另一种途径是和亲。两汉时期，汉王朝和匈奴关系的两大主题是争战与和亲。争战就是打仗，匈奴南侵，汉军就北击，经过长期的反复较量，到了公元1世纪中叶的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此后，南匈奴归附于汉，北匈奴仍然时常侵犯汉边，但由于汉军、南匈奴以及鲜卑的打击加之内乱，一部分或降汉或降鲜卑，最后余部西迁。但是，汉匈争战并不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而是随着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内部形势的变化断断续续地进行的，也就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和谈，于是出现了“和亲”。实际上，和亲从西汉初年就开始了，汉高帝刘邦白登之围被解之后，让大臣刘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汉匈和亲由此开始，并断断续续地贯穿于汉匈关系的始终。和亲过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现象值得注意：一个是双方使者往来不断，尤其是汉廷宗室公主及随从人员入居匈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嫁作呼韩邪单于成为宁胡阼氏，这就是尽人皆知的“昭君出塞”；另一个是，每次和亲，汉廷都赠予匈奴单于各种各样的汉朝物产，并且种类和数量都不断增加，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载，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和亲时所赐物品有“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纈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绀、绿纁各四十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汉朝各种各样的物产源源不断地流入到蒙古高原等地，汉文化也由此向北大规模扩展。

争战和和亲之外，还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商贸。汉王朝和匈奴南北毗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边关贸易，并且在战争和和亲的过程中，这种贸易是经常发生的。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初年，汉与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后来即使匈奴绝和亲，但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汉匈长期的边关贸易，双方大量的物资交流，同样使大量的汉朝物产流入匈奴，并在汉匈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是通过争战、和亲、贸易这三种途径，汉王朝和汉文化大踏步地向北扩展。这种扩展不仅仅是物品的传播，也不仅仅是人的流动，而是把中原的汉文化传了过去，使得匈奴的日常生活、生产，包括埋葬习俗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城址建设，阿巴坎的宫殿建筑显然是模仿汉朝建筑建造的，墓葬中出现了随葬车马和车轮等这些本来是汉朝的习俗等。总之，汉文化对蒙古高原以及外贝加尔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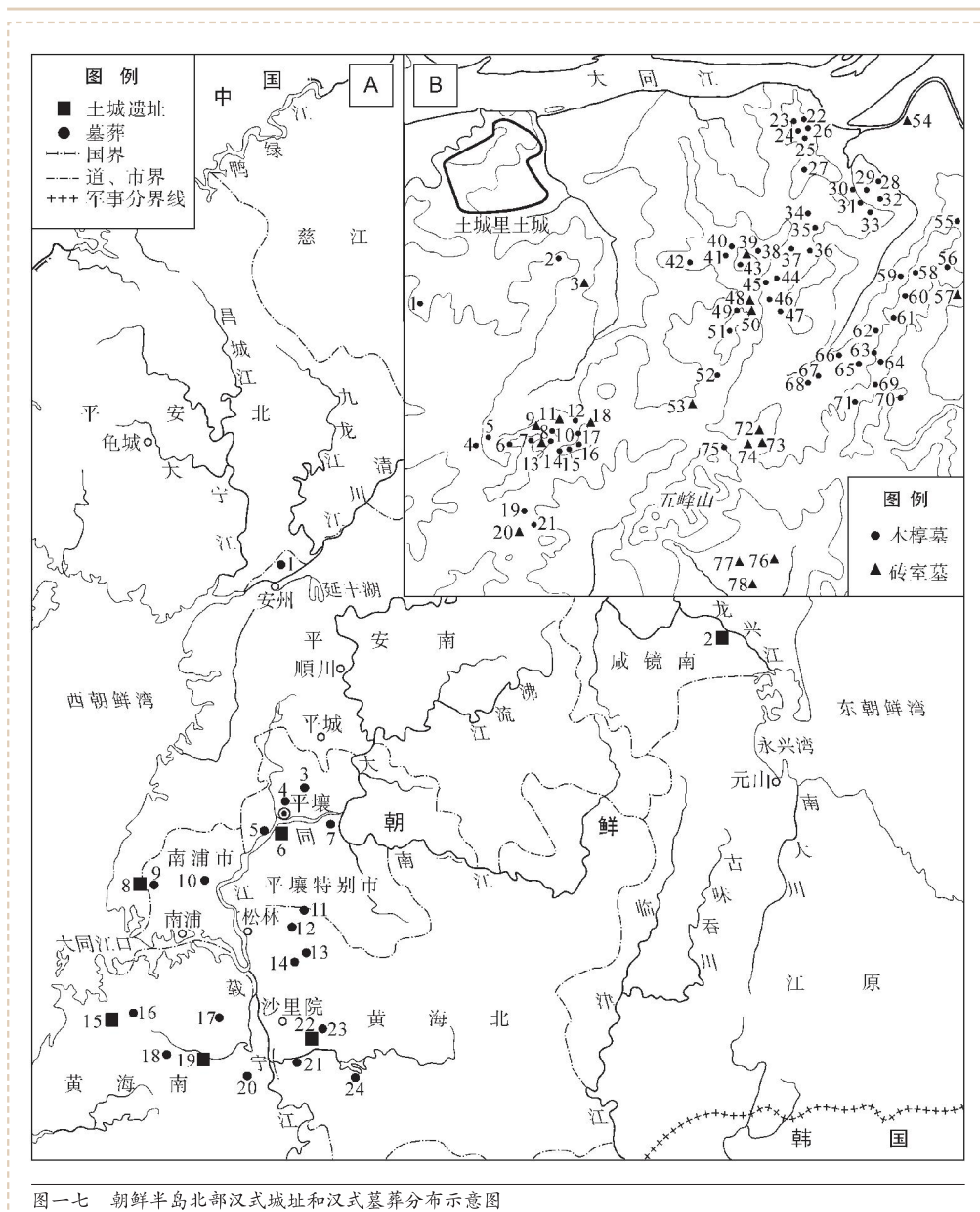
三、走向朝鲜半岛

接下来我们看汉王朝和汉文化如何走向朝鲜半岛。从西安、洛阳出发向北，经过北京向东再穿过辽东半岛，就到了朝鲜半岛。关于朝鲜半岛，今天我们要分成北部和南部两部分来讲，因为当时北部和南部的社会发展及其同汉王朝的关系完全不同。现在北方的朝鲜和南方的韩国，大体上是以北纬 38° 线为界的，实际上两千多年前，朝鲜半岛的北部和南部大体上也是以北纬 38° 线为界的。当然，当时还没有北纬 38° 线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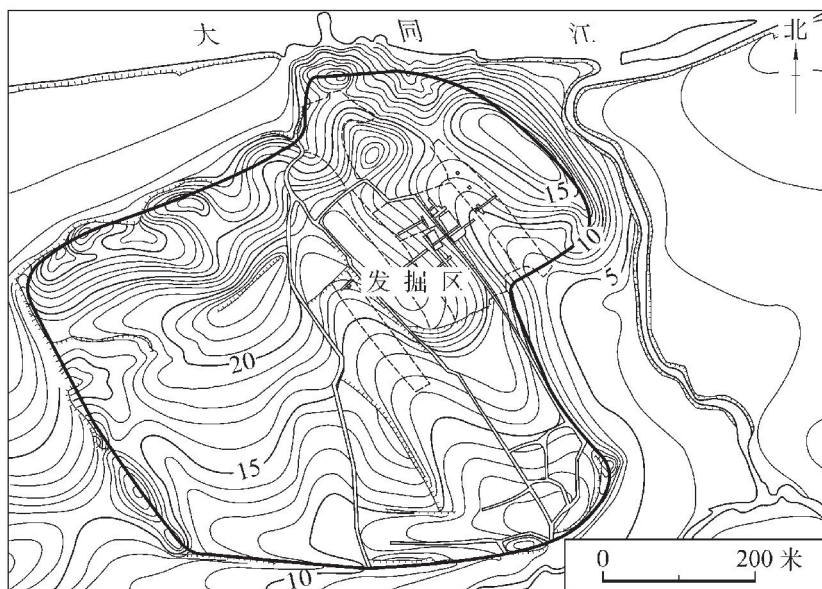
(一) 朝鲜半岛北部

两汉时期的朝鲜半岛北部，先后经历了卫满朝鲜和汉置郡县两个阶段。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西汉初年，燕人卫满率众迁往朝鲜自立为王，都王险（今平壤），并传国至孙右渠。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此后汉置郡县虽多有废合，治所也多有变动，但整个两汉时期，半岛北部始终处在汉郡县的管辖之下。因此，以今平壤一带为中心，半岛北部遗留有丰富的汉文化遗存，其分布范围南至黄海南道的载宁江中上游地区（图一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这些发现的了解还有限，掌握的材料还不够系统。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基于现代国际关系的考虑，我们把这些汉文化遗存称为汉式城址和汉式墓葬等。

迄今为止，朝鲜半岛北部发现的汉式城址有六处，又称之为“土城”，都是当时的郡县治城。其中，位于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南岸的土城里土城（图一八），城墙大多为夯土筑成，平面呈不规则形，东西长约 700 米，南北宽约 600 米，周长约 2 400 米，面积约 31 万平方米。这个城址现在已经完全被毁掉了，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中，在城内清理出柱础石、甬路、水井和排水道等建筑遗迹以及手工业作坊遗址等，出土了大量汉式遗物，包括云纹瓦当，“乐浪礼官”“乐浪富贵”“千秋万岁”“万岁”等文字瓦当（图一九），“乐浪太守章”“乐浪大尹章”等印章，以及乐浪郡所辖朝鲜等县的令、长、丞、尉等印章的封泥等。关于这座城址的年代和性质，我国以及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学者都认为，它是公元前 2 世纪至 3 世纪的乐浪郡的郡治所在，但朝鲜学者认为与汉朝无关。实际上，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来看，这个城址是乐浪郡的郡治所在是毫无疑问的，并且是在汉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建造的。



朝鲜半岛北部发现的汉式墓葬数以千计，据日本学者统计有近四千座。各地都有发现，尤其是平壤周围及其以南地区更为密集。就墓葬形制结构来看，有土圹墓、木棺墓、木椁墓、砖椁墓、砖室墓以及瓮棺葬等多种类型，都是在汉文化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因为半岛北部传统的墓葬结构属于石棺墓类型，



图一八 朝鲜平壤土城里土城址平面图



图一九 朝鲜平壤土城里土城址出土瓦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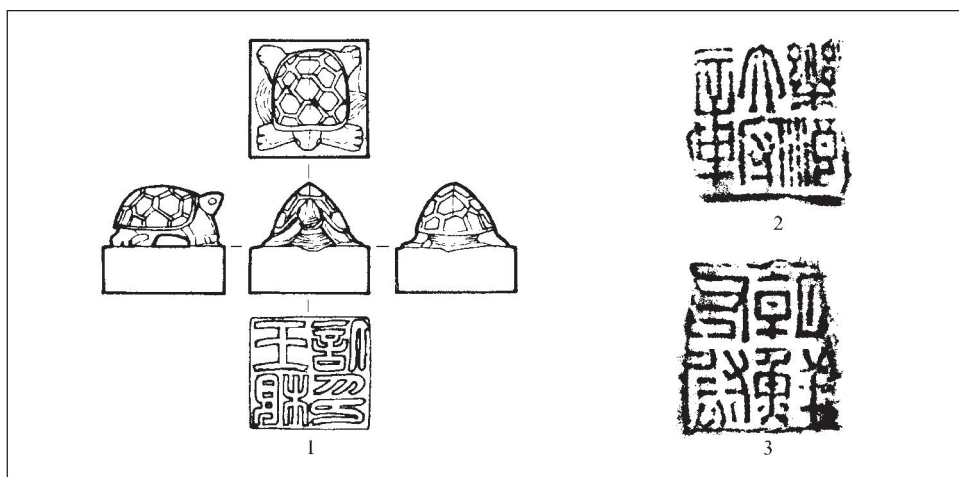
而上述汉式墓都是汉代墓葬的常见类型，并且其演变序列也与我国境内的汉墓基本一致。

朝鲜半岛北部发现的汉器和汉式器更是数量众多、种类多样，除了上面讲到的土城里土城址出土的瓦当以外，还有印章、封泥、钱币及钱范、铜镜、铜器皿、铁器、铜质和铁质的车马器、玉器（图二〇）、漆器等，都是我国境内汉墓中常见的文物。其中，铜镜最为常见，并且大都是完整器，种类有星云纹镜、连弧纹铭带镜、四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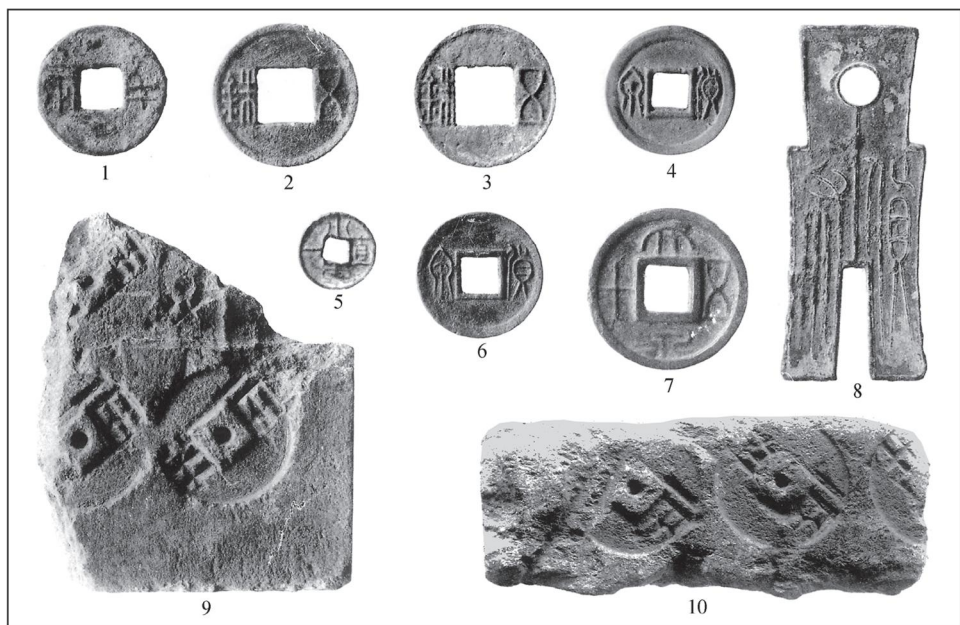
图二〇 朝鲜平壤地区汉式墓出土玉璧

四虺纹镜、方格博局纹镜、云雷连弧纹镜、多乳禽兽镜、神兽镜、画像镜、夔凤镜、龙虎镜等，都是汉地常见的镜类，它们的年代自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平壤市石岩里 219 号墓出土的“王根信印”龟钮银印，土城里土城址发现的“乐浪太守章”“朝鲜右尉”等封泥（图二一），无疑是汉朝郡县统治的实物例证。土城里土城址不仅出土有半两钱、五铢钱、货泉、小泉直一、大泉五十、货布等钱币，而且发现了铸造半两钱的钱范（图二二），说明当时不仅有汉朝内地钱币的传入，



图二一 朝鲜平壤附近出土银印和封泥

1. 石岩里 219 号墓出土银印 2、3. 土城里土城址出土封泥



图二二 土城里土城址出土汉朝钱币与钱范

1. 半两 2、3. 五铢 4、6. 货泉 5. 小泉直一 7. 大泉五十 8. 货布 9、10. 半两钱范

并且在西汉早期当地曾铸造半两钱等汉朝流通货币。漆器大多发现于木椁墓中，不仅数量多，而且不少刻有铭文，如石岩里 194 号墓出土的一件漆盘上有“永始元年蜀郡西工造……”的铭文，一件漆扁壶上有“阳朔二年广汉郡工官造……”的铭文，直接证明了它们分别产自西汉的蜀郡工官和广汉郡工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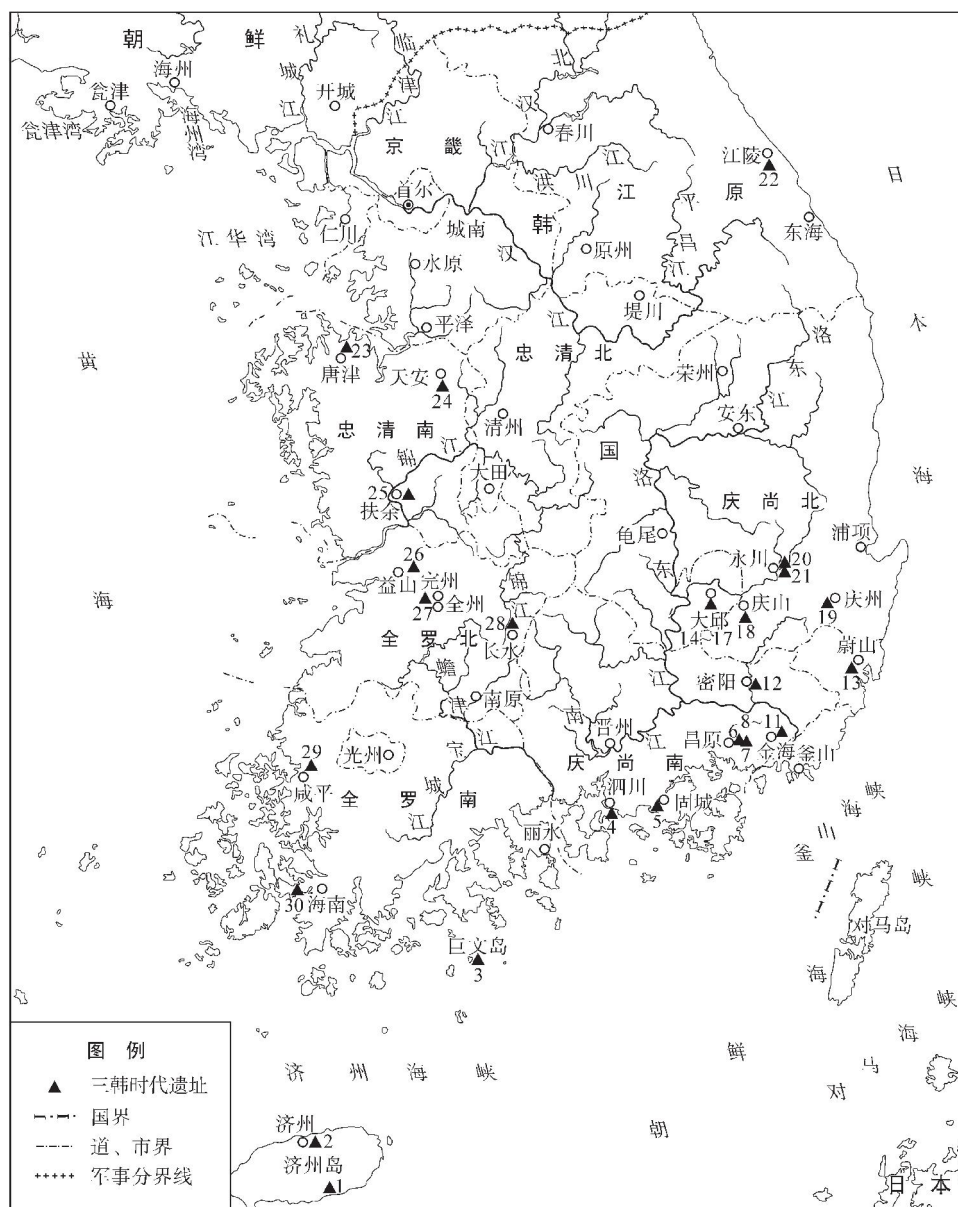
上述朝鲜半岛北部发现的汉式城址、汉式墓葬以及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汉代文物，是在汉初燕、赵、齐地居民流徙到半岛北部和汉武帝时期在这里设置乐浪等四郡的历史背景之下，随着汉朝内地居民的大量迁入和汉朝物产的大量流入而出现的。这些发现从考古学上证明了这一地区属于汉王朝直接统治下的郡县地区。

（二）朝鲜半岛南部

从朝鲜半岛北部向南跨过“三八线”，就到了现在的韩国境内，即朝鲜半岛南部。两汉时期，半岛南部正处于由氏族社会向国家演进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先后形成了三个古国，即西部的马韩、东北部的辰韩和东南部的弁韩。这一时期，韩国的考古学界称之为“原三国时代”，历史学界称之为“三韩时代”。因此，如

果将当时的半岛北部称为“乐浪四郡地区”，那么南部可称为“三韩地区”。

目前，韩国境内发现汉代文物的地点多达三十余处（图二三），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最北边的一处是韩国首尔仁川机场附近的仁川云北洞遗址，也是最新



图二三 朝鲜半岛南部出土汉代文物的三韩时代遗址分布示意图

的发现，出土有大量铁铤铜镞和五铢钱，应当是汉武帝时期传过去的。最南边的发现位于济州岛上，其中的山地港遗址位于济州岛的北端，1928年在港口建设施工中，于东侧海岸的岩壁附近发现一组遗物计二十一件，包括货泉、大泉五十、货布、五铢钱等汉朝钱币，汉镜残片以及仿汉“见日之光”铭连弧纹铭带镜等，它们的年代为西汉至新莽时期。另外，金海市良洞里墓地也很重要，其中的162号墓可能是弁韩狗邪国首领的墓葬，墓中出土的一件方格博局纹四神镜，现在已经成为当地博物馆的标志；322号墓则出土了一件带有铭文的西汉铜鼎。从这些遗址的分布状况看，它们大多分布于马韩和弁韩地区，而辰韩地区相对较少，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韩各国与汉王朝交流的差异。

韩国境内发现的汉代文物，虽然数量和种类远不及半岛北部，但仍然有钱币、铜镜、铜器皿、铁器以及玻璃环等文物。

钱币的发现地点分布很广，北起仁川南到济州岛都有发现，种类主要有半两钱、五铢钱、货泉、大泉五十、货布等，时间上从西汉初年直至东汉时期。

铜镜是发现较多的汉代文物之一，主要发现于半岛东南部的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一带。铜镜的种类主要有蟠螭纹镜、草叶纹镜、星云纹镜、连弧纹铭带镜、单圈铭带镜、四乳四铭镜、四乳四魼纹镜、多乳禽兽镜、方格博局纹镜等，它们的年代从西汉初年一直到东汉时期，但绝大多数是西汉中期以后的铜镜。这是一件星云纹镜（图二四），发现于庆尚南道昌原市茶户里1号墓，属于典型的西汉中期的铜镜，并且跟山东临淄汉墓出土的同类铜镜十分相似。这一件方格博局纹镜（图二五），发现于金海市良洞里162号墓，铭文带的铭文是“尚方佳镜真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直径20.2厘米，是典型的公元1世纪新莽时期的铜镜。

除了铜镜之外，韩国境内出土的汉代铜器还有铜鼎、铜盖弓帽、铜带钩、铜铃和铜弩机等，其中最引



图二四 韩国昌原市茶户里1号墓出土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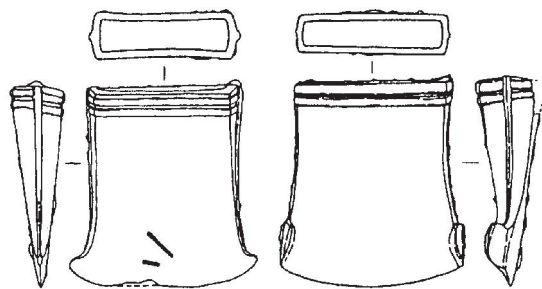
图二五 韩国金海市良洞里162号墓出土铜镜

人注目的是良洞里 322 号墓出土的铜鼎（图二六）。这件铜鼎不仅在形态上与汉代的铜鼎相似，而且口沿下方刻有“西口宫鼎容一斗并盖重十一斤第七”的铭文，是汉代的铜鼎无疑。

韩国境内发现的汉代铁器也值得关注，有铁空首斧、凿、锄板、镰刀、剑和釜等。其中，密阳市校洞墓地出土的梯形锄板和完州郡葛洞墓地出土的镰刀均为铸造品，它们的形制和制作技术与我国战国晚期至汉初燕地流行的同类铁器别无二致；京畿道加平郡大成里出土的铸造的铁空首斧（图二七），也跟汉代东北地区流行的铁空首斧基本相同。它们无疑是从汉朝传过去的。朝鲜半岛的铁器文化是在我国战国至西汉铁器文化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因此，从中国传入的铁器与当地制作的铁器有着明显的不同，通过认真观察和研究是可以将两者区分开的。



图二六 韩国金海市良洞里322号墓出土铜鼎



图二七 韩国京畿道加平郡大成里出土的铁空首斧

（三）汉王朝及汉文化向朝鲜半岛的扩展

上述朝鲜半岛发现的汉式城址、汉式墓葬，尤其是汉代文物，从考古学上为我们描绘了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朝鲜半岛的大致图景。

半岛北部大量汉式城址、汉式墓葬，尤其是数量众多、各种各样的汉代文物的发现，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秦汉之际先是数以万计的燕、赵、齐地的居民迁入，后是汉武帝时期设置乐浪等四郡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文化迅速扩展到这一地区并生根开花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两汉时期半岛北部社会历史的变化不仅仅是汉文化的传入，更重要的是社会形态完成了从早期国家

向封建郡县制的历史性跨越。

半岛南部与北部地区完全不同，当时并未进入汉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汉王朝的势力范围也没有达到这里，三韩诸国在政治上与汉王朝没有直接的关系，历史文献也少有记载。但是，韩国境内诸多的考古发现表明，汉文化对三韩地区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深远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说明。

一个层面是汉朝物产的传入。刚才大家看到的韩国境内发现的各种汉代文物，无论是钱币、铜镜、铜器皿还是铁器等，无疑都是从汉朝传过去的。其中，有些是从汉地直接传过去的，有些则是经由乐浪四郡传过去的。它们从汉朝传入的途径，跟半岛北部有所不同，北部是在郡县统治下汉朝境内物品的流通，而半岛南部则主要是在人员往来和商贸活动等过程中发生，进而形成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另一个层面是当地对汉文化的吸收。随着人员的往来和商贸活动，大量汉朝物产流传到三韩地区的同时，汉文化也随之传播到三韩地区并被当地居民逐步吸收。譬如，铁器文化的传入。中国的铁器传入朝鲜半岛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晚期，但半岛地区铁器的制作是从两汉时期开始的，并且获得了初步发展。又如，陶器的烧造。在汉文化进入前，半岛地区传统的陶器烧造技术是泥质或夹砂的红陶器和黄红色陶器，后来在汉代陶器烧造技术的影响下开始烧制灰陶器。再譬如，夯土筑城技术的采用。半岛地区的筑城传统是在山上用石头筑城，也就是所谓的“山城”，而在平地上用夯土筑城是汉文化的传统。韩国首尔市东南郊的风纳土城，韩国学者一般认为是早期百济王城，就是一座四周环绕有夯土城墙的城址，尽管城墙的夯筑技术比较原始，但这种在平地上用夯土建造城墙的城，毫无疑问是在汉代筑城技术的影响下建造的。就埋葬习俗来说，三韩时代墓葬中的木椁墓、瓮棺葬等丧葬方式，也都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出现的。

很显然，尽管朝鲜半岛北部和南部跟汉王朝的关系不同，但在汉王朝的经略和汉文化的影响下，两地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都发生了巨变。半岛北部地区，由于汉王朝郡县的设置和统治，社会政治实现了从早期国家到郡县制的历史性跨越。半岛南部地区，随着与汉王朝的密切接触、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社会生产的铁器化进程迅速推进，在三韩诸国从氏族社会向国家阶段的转变过程中，汉文化的进入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催化和加速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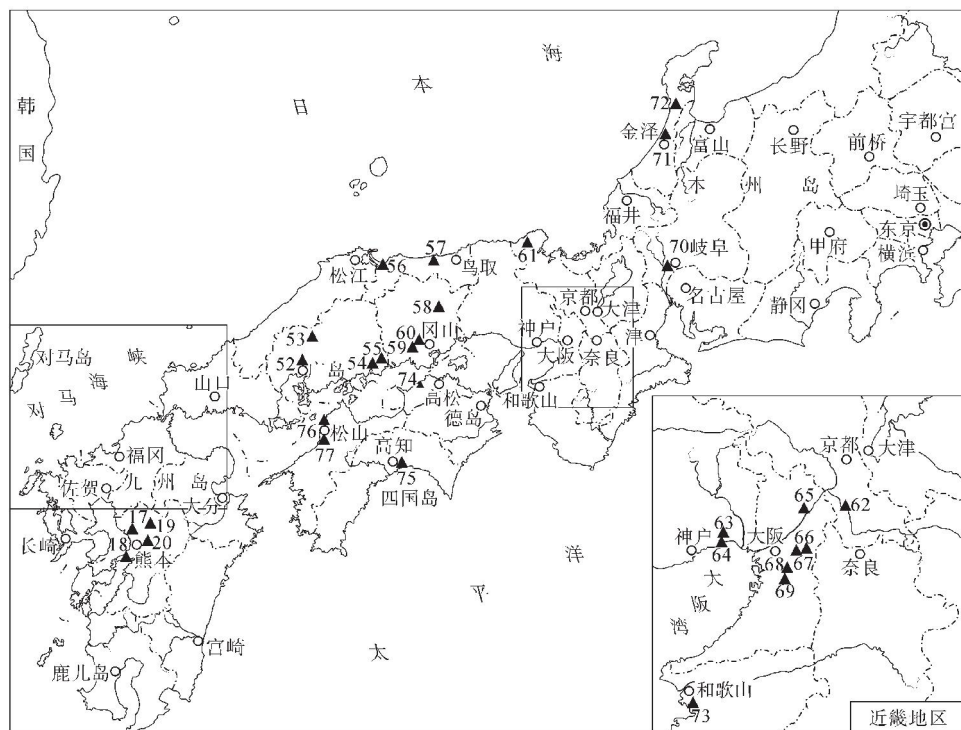
四、走向日本列岛

日本列岛，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倭地诸国”，因为在历史文献中，两汉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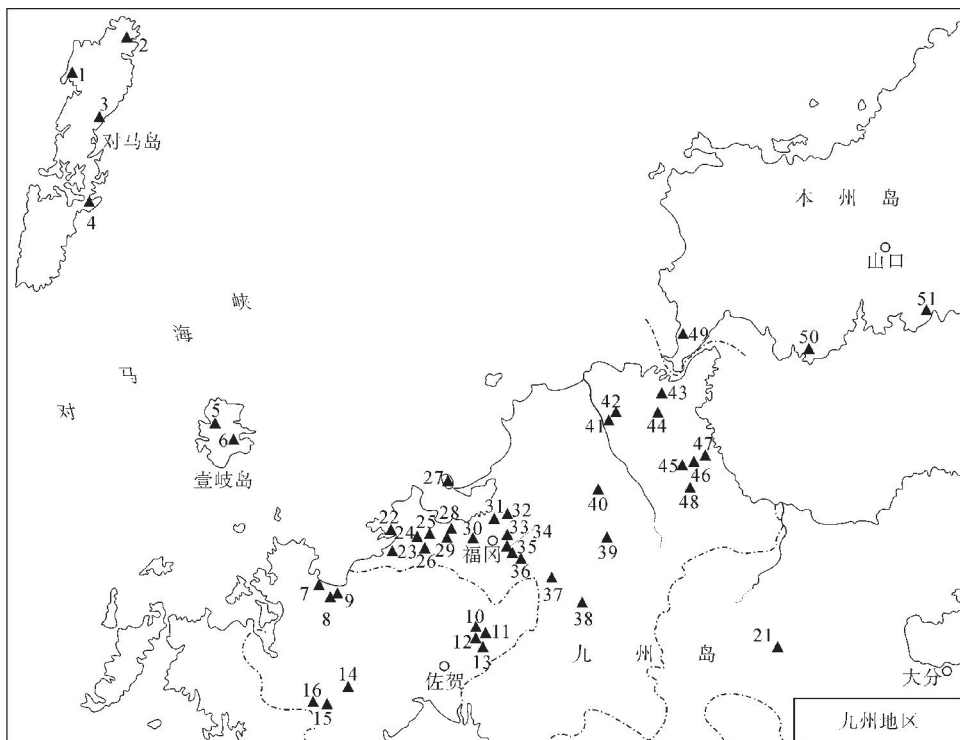
的日本列岛被称为“倭”，而倭地又有“百余国”。就年代来说，公元前3世纪末至3世纪初叶的两汉时期，大致相当于日本考古学上弥生时代的中期和后期。说起中国与日本列岛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了，到了秦汉时期达到了高峰，而全面接受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是从汉代开始的。但是，关于当时中日之间的交流，历史文献记载不多，只能从考古学上进行探索。

日本的考古学比较发达，考古发掘和研究都做得比较细致，我们对日本列岛有关中日古代交流的发现也了解得比较多，掌握得比较系统。在整个日本列岛，包括九州地区、中国地区、四国地区和本州地区，迄今已有七十多个地点发现了与汉文化有关的文物（图二八）。尤其在九州地区，汉代文物的发现地点更是密集，这在汉代文物出土地点分布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图二九）。

日本出土汉代文物的弥生时代遗址中，有不少遗址值得关注。譬如，地处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海上交通要冲的壹岐岛上的原之辻遗址，是一处弥生时代前期之末至古坟时代之初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在发现各种遗迹的同时，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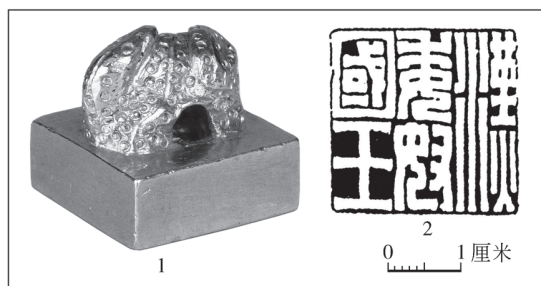


图二八 日本弥生时代遗址汉代文物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



图二九 日本九州地区弥生时代遗址汉代文物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

土有铜镜、铜车马器、铜剑、铜镞、铜权、货泉、大泉五十等大量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的文物。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断，该遗址可能是《魏志·倭人传》所载“一支国”的都邑性聚落。位于九州岛北端的福岡县平原村1号坟丘墓，墓主人为女性，据推测是公元200年前后伊都国的“国王”之墓，墓中出土



图三〇 日本福岡县志賀島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及印文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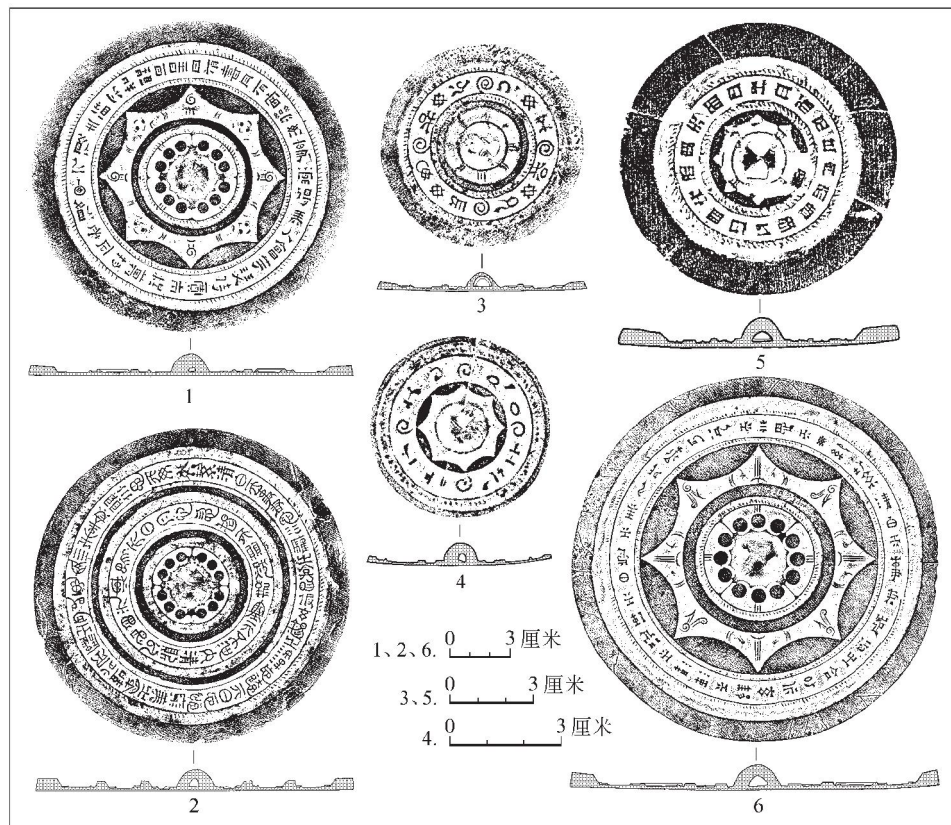
的大量随葬品中，仅汉镜和汉式镜就多达四十件。佐贺县的吉野里遗址，是一处弥生时代前期至后期之末的大型墓地和聚落遗址，现在已经开发建设成一处著名的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钱币、铜镜和铁器等汉代文物。

就日本列岛发现的汉朝文物来说，最有名的是“汉委奴国王”金印（图三〇）。这枚金印是17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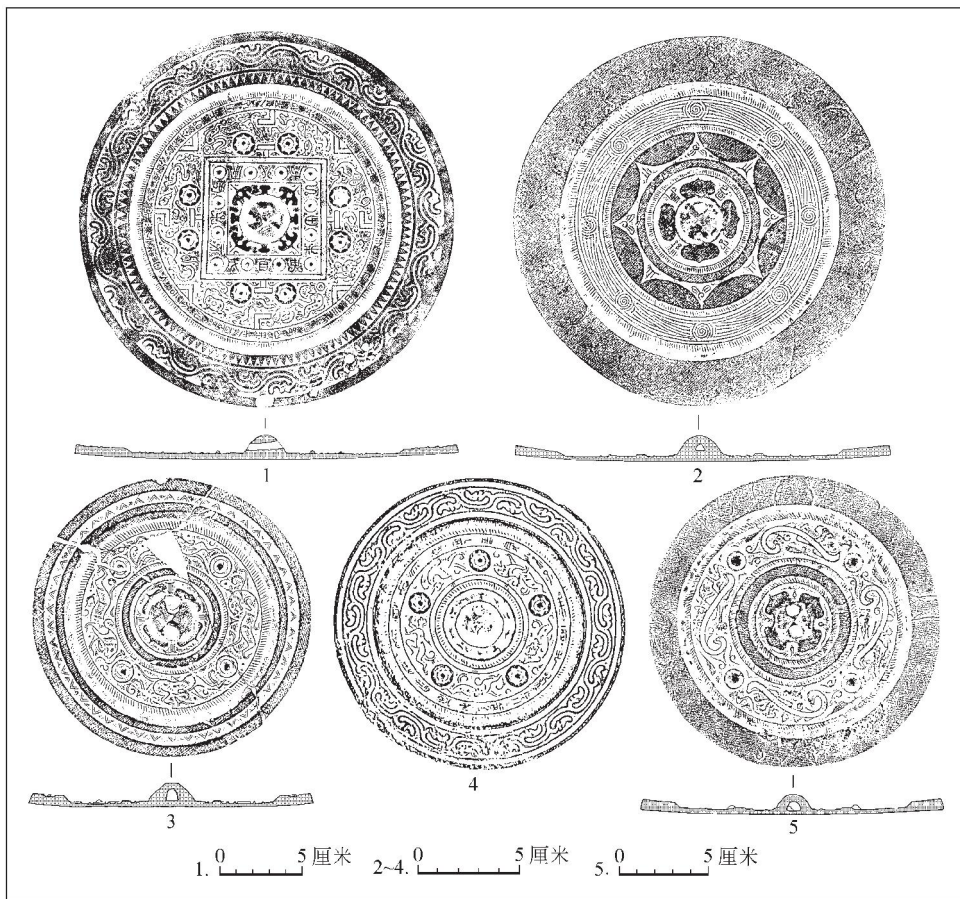
年在福冈县志贺岛被偶然发现的，关于其真伪经过了长时期的争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被确认真品，现在已经被确定为日本的国宝级文物。这枚金印，可能与《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的历史事件有关，成为汉王朝与倭地诸国关系的重要实物例证。

钱币是弥生文化遗存中最常见的汉朝文物之一，出土地点较多，分布范围较广，西起长崎县的壹岐岛、东到本州岛大阪府八尾市的龟井遗址都有发现。钱币的种类有西汉初年的半两钱、西汉五铢钱和东汉五铢钱，以及货泉、大泉五十、货布等新莽时期的钱币，都是汉王朝的流通货币。

铜镜，这里指的是来自汉朝的汉镜，也就是日语中所谓的“舶载镜”，是弥生时代遗址中发现地点最多、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汉代文物。铜镜的种类也很多（图三一、图三二），主要有彩绘镜、四乳云雷纹镜、草叶纹镜、星云纹镜、连弧



图三一 日本出土汉代各种连弧纹铭带镜



图三二 日本出土汉代铜镜

1. 方格博局纹镜 2. 云雷连弧纹镜 3、4. 多乳禽兽纹镜 5. 四乳四虺纹镜

纹铭带镜、重圈铭带镜、单圈铭带镜、四乳四虺纹镜、方格博局纹镜、多乳禽兽镜、云雷连弧纹镜、连弧纹镜、浅浮雕禽兽镜、四乳禽鸟镜、四叶夔凤镜、四叶兽首镜、直行铭文夔凤镜等，从西汉早期至东汉末年的各类铜镜基本上都可以见到，但主要是西汉中期以后的铜镜，这可能与倭地诸国与汉王朝的交往在西汉中期以后趋于频繁和密切有关。

日本弥生时代遗址出土的汉朝铜器除了钱币和铜镜之外，还发现有其他一些铜制品，主要包括铜剑、铜镞、剑格、剑首等兵器及部件，铜盖弓帽之类的车马器，用于器物装饰的铜泡、铜四叶形饰等。总体来看，数量不多，种类有限，但分布很广，从九州到本州西部都有发现。

除了铜器之外还有铁器，主要发现于九州北部、四国地区和中国地区，种类有空首斧、凿、锛、环首削刀、环首长刀、中长剑、矛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弥生文化遗址发现的外来铁器中，有些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汉朝铁器，有些则是从朝鲜半岛传过去的。



图三三 日本福冈县三云南小路1号墓出土玻璃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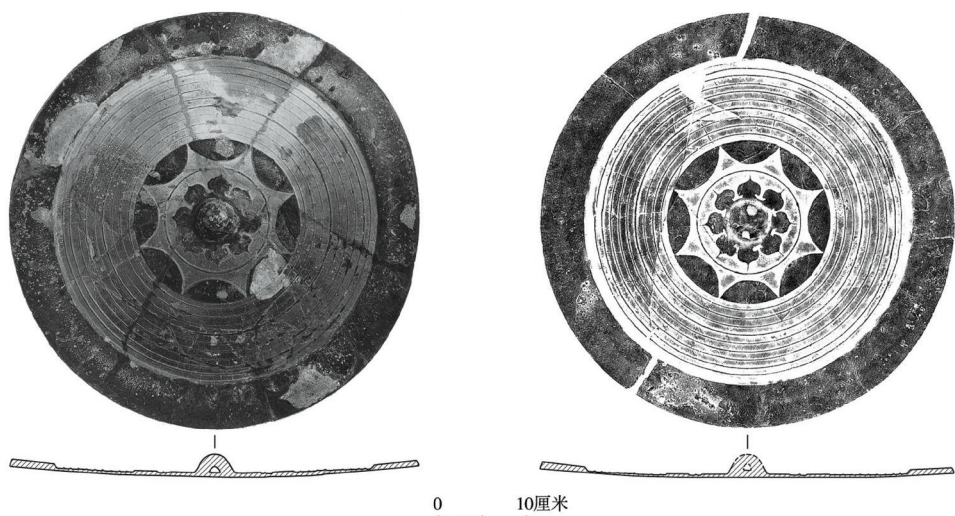
上述金属制品以外，日本弥生文化遗址中还出土有“蜻蜓眼”玻璃珠和玻璃璧等，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汉朝物品。譬如，福冈县三云南小路1号墓出土的玻璃璧残片（图三三），一面饰谷粒纹，一面为素面，与我国境内汉墓出土的同类器基本相同。

上面是日本列岛弥生文化遗址中汉代文物发现的大致情况。那么，如何从这些考古发现看汉王朝与日本列岛的关系呢？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列岛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发生了，但当时可能主要是文化上的交流，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学证据使之具象化。因此，大家一讲到中日古代交流，首先想到的是秦朝徐福东渡的历史故事。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历史事件，就是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之药，曾派遣齐人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入海求神药，徐福到了亶洲之后自立为王不再回还，而这个亶洲一般认为就是日本的九州岛。这就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记载的：“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这一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目前尚不能完全加以证明，但根据《史记》等文献的可靠性并结合九州地区有关的考古发现推测，这一事件应当是史实。现在，从九州到本州地区，日本有二十多处与徐福登陆有关的传说或“遗迹”，在日本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徐福学”。汉王朝同倭地诸国的交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

应当指出的是，汉王朝同倭地诸国的交往与汉王朝向西凿空西域、向东北经略朝鲜半岛北部不同，并不是汉王朝主动向东扩展，而主要是倭地诸国主动跟汉王朝结交。因为，当时的汉王朝是东亚最大、最强盛的帝国，在倭地诸国看来，能跟汉王朝建立关系是自身强大的象征，这在历史文献中可以窥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而《汉

书·王莽传》的记载是“东夷王渡大海奉国珍”。到了东汉时期，倭地诸国同汉王朝的联系又进一步增强。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生口”是什么？就是奴隶。基于上述文献记载，有日本学者认为，倭地诸国已经被纳入到汉朝的册封体系之中。但在我看来，虽然倭地诸国多次派遣使者到汉朝来朝贡，也曾有汉光武帝“赐以印绶”之类的事情，汉廷也曾赐予倭地的某些古国封号，但当时汉王朝对倭地诸国的“册封”只不过是虚名而已。尽管如此，倭地诸国通过遣使朝贡而同汉王朝建立起了直接的关系，是历史的真实。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大量的汉代物产传到了日本列岛，汉文化也随之向日本列岛迅速扩展。

两汉时期汉文化东传日本列岛，首先是物品的传入，随后是倭地诸国派遣使者到汉朝来朝贡，再后来还出现了汉朝工匠东渡日本列岛。大家看到的这种连弧纹铜镜（图三四），发现于福冈县平原村1号坟丘墓，共出土了五件。它虽然具有鲜明的汉镜风格，但相同的铜镜在中国境内没有发现，并且它的直径达46.5厘米，正好是东汉的二尺，而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汉代铜镜直径为36厘米。据我们反复研究，推断这种铜镜不是汉朝境内所产，而是东汉晚期洛阳一带的铸镜工匠东渡日本九州之后在当地铸造的，成为东汉时期汉朝工匠曾经东渡日本列岛的实物见证。



图三四 日本福冈县平原村1号墓出土连弧纹镜

汉文化东传日本列岛，对当时日本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先秦时期已经传播到日本的稻作农耕技术，两汉时期——也就是弥生时代的中后期，在日本各地迅速扩展开来。日本的青铜器和铁器文化，都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大致同时发生的，随着汉文化的进入，青铜器、铁器的制作和使用都获得迅猛发展。同时，漆器、玻璃器的制作和使用也有所发展。就拿铜镜来说，镜、剑、玉是日本古代文化中的“三宝”，铜镜



图三五 日本对马岛赤崎石棺墓出土仿汉镜

在中国是一种日常生活用器具，而在日本却被视为“宝物”和“威信财”，弥生时代中后期的倭地诸国虽然可以从汉朝输入汉镜，但数量毕竟有限，于是开始模仿汉镜在当地铸造“仿制镜”，也就是仿汉镜（图三五）。当然，倭地居民采用的是石范铸镜技术，铸造铜镜的质量显然不能跟汉镜相比，但毕竟开始了铜镜的铸造。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汉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明显，譬如木椁墓、坟丘墓、瓮棺葬等埋葬方式，也都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总而言之，汉文化东传日本列岛，不仅仅是文化的传播，而是对倭地诸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社会政治体系的变迁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加速了日本古代社会从氏族社会向国家阶段的演进和古代文明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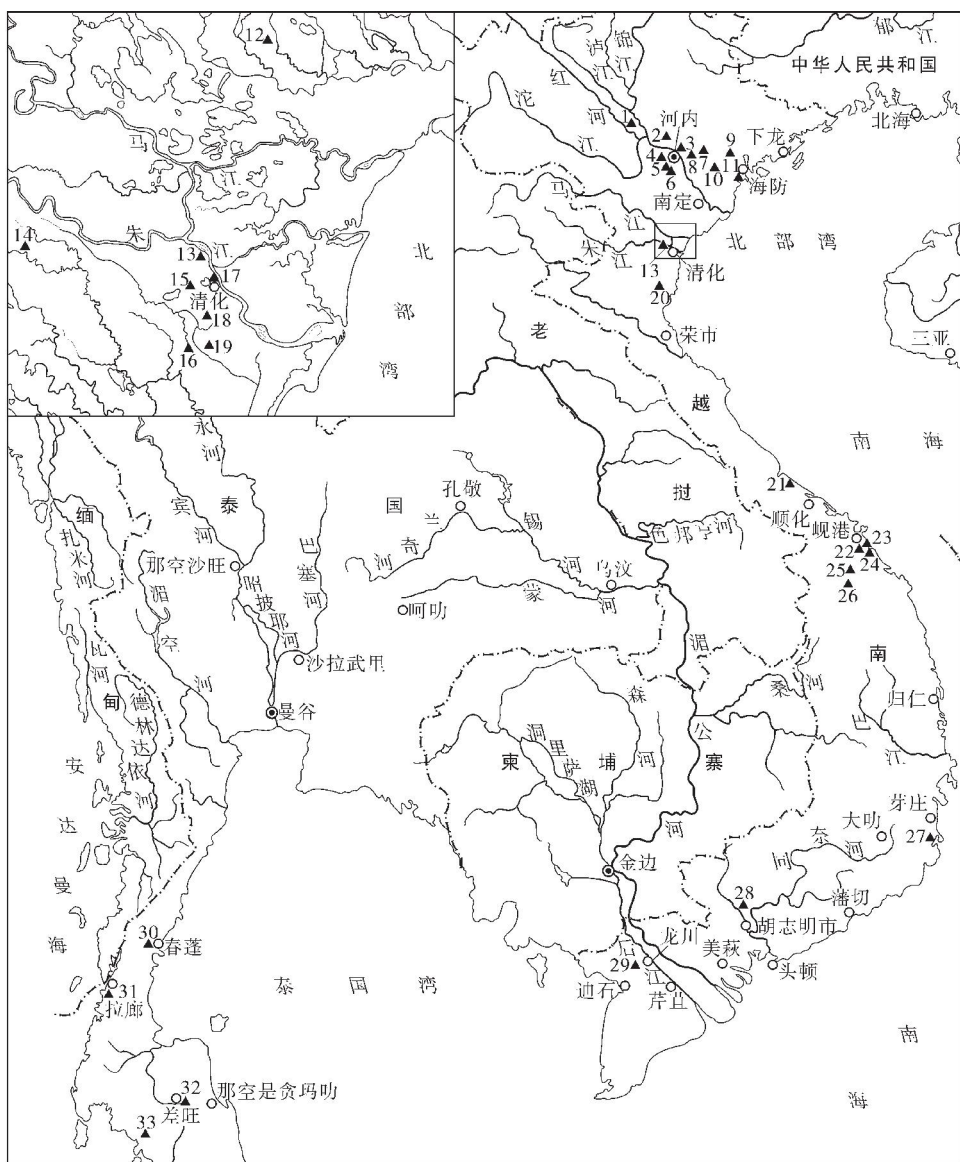
五、走向中南半岛

我国的南边，与我国陆地山水相连的是中南半岛及其西侧的马来半岛，现在分布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五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

关于汉王朝和中南半岛的联系，文献上是有所记载的。中南半岛东北部，也就是越南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情况，与朝鲜半岛北部有些相似。按照《史记·南越列传》的记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也就是说，秦统一时期，岭南地区设置三个秦郡，而秦代岭南三郡的南界已经到达了越南北部一带。汉武帝时期平定南越后在岭南设置九个汉郡，其中的交趾、九真、日南等三郡就设在中南半岛的东北部，成为汉朝郡县统治管辖的一

部分。而中南半岛的南部、西部直到马来半岛的北部，与朝鲜半岛南部的情形有点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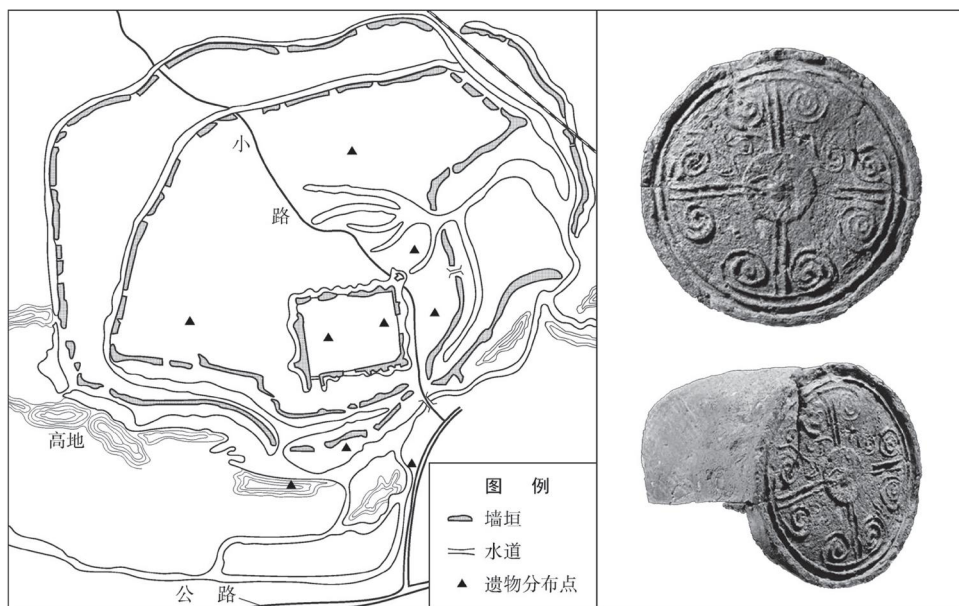
在这个地区，目前已在三十多个地点发现了汉代文物（图三六），其中有些地点属于汉式城址和汉式墓葬，而最值得关注的是越南的古螺城遗址。



图三六 中南半岛汉代文物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

古螺城遗址位于越南首都河内东北郊的东英县，是一处由内、中、外三重城垣以及护城壕构成的大型城郭遗址（图三七）。它的内城呈方形，位于南部居中位置，周长 1 650 米；中城和外城呈不规则方形。关于古螺城的性质，虽然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但无疑与汉代交趾郡密切相关，并且它的布局、结构和营建技术具有鲜明的汉代郡县治城的特点。城内出土的大量文化遗物中，半两钱、三棱铜铍、砖瓦和瓦当等与汉文化密切相关。譬如，绳纹板瓦、筒瓦、云纹瓦当以及花纹砖等，虽然它们的颜色大多呈黄白色和黄褐色而与汉朝内地的灰色砖瓦有明显差异，但其制作技术乃至瓦当上的卷云纹等装饰，都与广东、广西乃至境内其他地区发现的汉代同类遗物相似，显示出它们同汉文化的密切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是汉朝工匠在当地制作的，因为，这一地区本来就属于汉朝的郡县统治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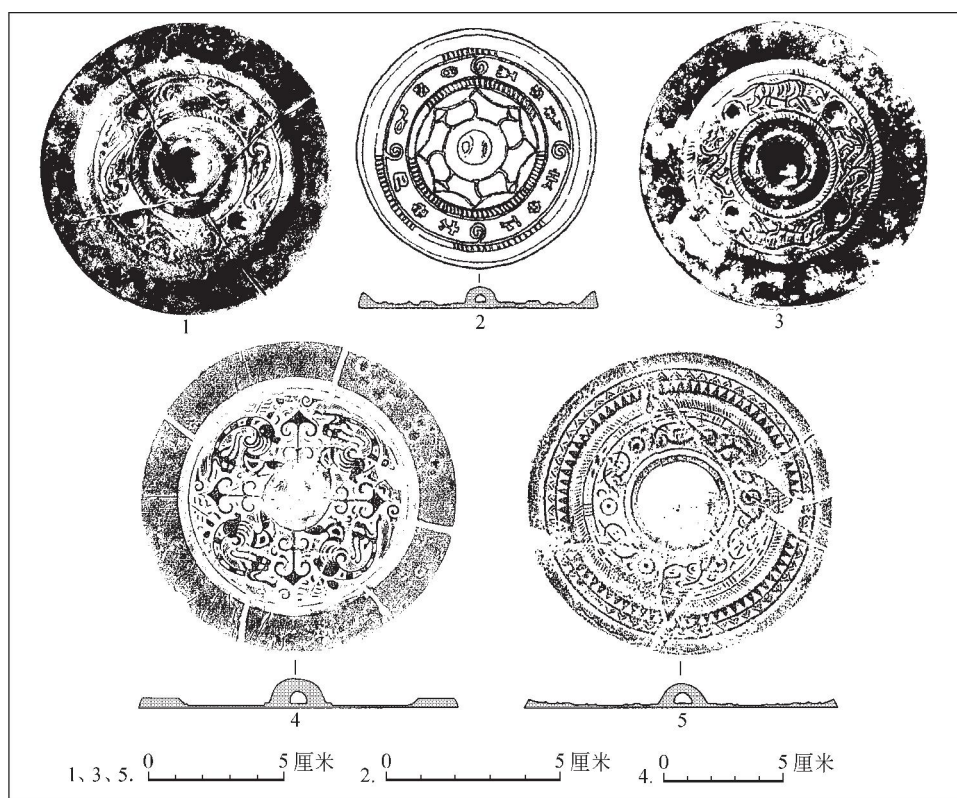
中南半岛发现的汉代文物，本来是种类多、数量大，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量的资料没有系统整理，更没有公开发表，许多重要文物只是被收藏在各地博物馆的库房里，尤其东北部地区更是如此。据目前我们能够掌握的材料和实地考察的结果来看，中南半岛出土的汉代文物主要有钱币、铜镜、铜器皿以及少量其他类别的文物。



图三七 越南河内古螺城遗址平面示意图及出土瓦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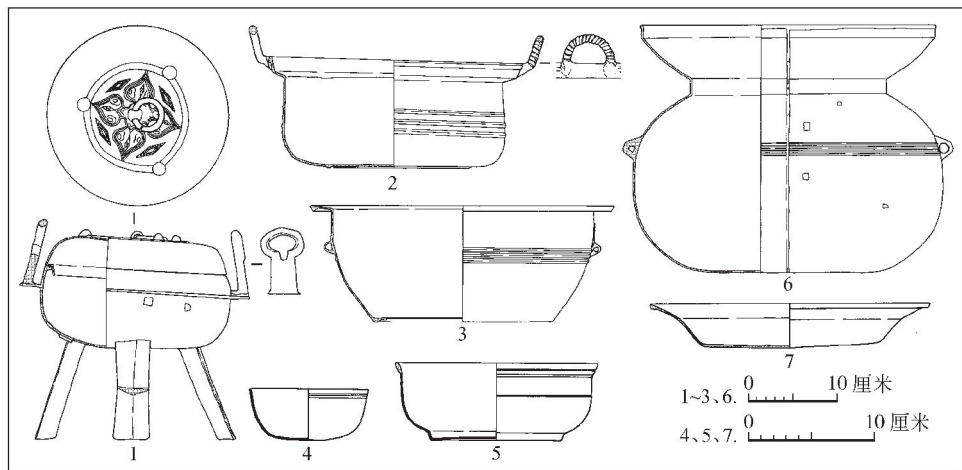
钱币主要发现于中南半岛东北部汉郡县地区，尤其是各地汉式墓中多有发现，种类有半两钱、五铢钱、货泉、大泉五十等。

铜镜主要发现于中南半岛东北部地区的汉式墓中，南部的胡志明市附近以及马来半岛北部也有发现，包括西汉中期的星云纹镜，西汉晚期的连弧纹铭带镜、四乳四虺纹镜，东汉时期的方格博局纹镜、多乳禽兽纹镜、四叶凤鸟纹镜，以及东汉末年的夔凤镜、盘龙镜等（图三八）。



图三八 越南东北部及南部地区出土汉代铜镜

铜器皿主要发现于中南半岛东北部地区的汉式墓中。譬如，今越南北部清化省境内，1934~1940年间曾在多个地点发掘了一批汉式墓，其年代为公元2世纪前后。这批汉式墓出土的随葬品中，除了汉式陶器和模型明器之外，还有不少铜器皿，包括铜鼎、双耳锅、釜、甗、甬、碗、盘等（图三九）。其中的铜鼎、双耳锅等与广西合浦汉墓发现的同类铜器别无二致。另外，越南富寿省嘎乡汉式



图三九 越南清化省汉式墓出土铜器皿

1. 鼎 2. 双耳锅 3. 铜 4. 碗 5. 钵 6. 釜 7. 盘

墓出土的铜樽（图四〇），广南省来宜土圹墓出土的铜鼎、双耳锅、盘、鍬壶等铜器，也都与我国境内的汉墓尤其是岭南地区东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这些铜器皿，显然是汉朝的东西，并且是经由岭南地区传过去的。

上述汉器之外，越南北部汉式墓中发现的陶器和陶质模型明器等，也具有鲜明的汉文化特征。譬如陶房屋和院落模型，是西汉后期逐步流行开来的一类随葬品，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汉式墓中多有发现，在当地博物馆中也有展出，它们与广州汉墓和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相似，显然是在汉朝丧葬文化影响下在当地制作的。

从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来看，汉王朝和汉文化向中南半岛的扩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区域进行讨论。一个区域是东北部地区，这里随着汉武帝时期交趾、九真、日南等三郡的设置而进入汉王朝郡县的直接管理之下，随着汉人大量进入，汉文化在这一地区得到迅速扩展。到了东汉时期，汉朝的郡县统治



图四〇 越南富寿省嘎乡汉式墓出土铜樽

和汉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增强。据史书记载，在汉光武帝时期的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发生了交趾郡的征侧、征贰姐妹聚兵反叛汉郡县统治的事件，随后，马援率大军南征，于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平定了征氏姐妹叛乱，并在当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如“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后汉书·马援列传》）等。由此，汉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经略进一步加强，汉文化的传播进一步扩展和深入。另一个地区是中南半岛的南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完全不同，这里没有汉郡县的设置，不属于汉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汉朝物产的传入和汉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以东北部的汉朝三郡为桥梁而实现的。

就汉王朝对中南半岛的经略和汉文化的传播路线来看，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陆路，也就是通过地处今广西地区的合浦郡和郁林郡进入半岛东北部的交趾、九真和日南等汉三郡地区，进而南下到半岛南部。另一条是海上水路，也就是南海海上通道，自南海郡、合浦郡等地出发，走水路到达交趾、九真以及日南郡，然后走水路继续南下西进，到达中南半岛的南部沿海地区。这就是著名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据史书记载，早在汉武帝时期，以海上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开辟，最远到达地处南亚岛国今斯里兰卡的已程不国。到东汉后期的汉桓帝时期，更是跟远在地中海地区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

至于马来半岛北部的今泰国境内，虽然远离汉朝郡县，但也发现了汉朝铜镜和汉文化风格的陶器，说明汉文化的影响已经远及这一地区。这一地区汉朝物产的传入和汉文化的影响，无疑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实现的。

结束语

上面，我们从中亚、西亚开始环绕中国一周直到中南半岛，简要介绍了各地的考古发现，从考古学上对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图景进行了描绘，下面作一个简单的小结。

两汉时期是中外交流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交流是双向的，但是走向世界是汉代对外交往的主旋律，主要表现为汉帝国的扩张和汉文化的扩展，也就是汉王朝和汉文化的走向世界。我国境内也发现有两汉时期的外来文物，说明当时也有外来物品和域外文化的传入，但两相比较，我们可以说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是

两汉时期中外交流的主流，也就是说，主旋律是“走出去”。

中外文化交流古已有之，但古代中国真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从汉代开始的，汉王朝和汉文化大踏步、全方位地走向世界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为什么我们讲到中国历史总要说“秦皇汉武”，那是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汉武帝时期开始真正走向世界。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真正的交流始于张骞凿空西域，是汉武帝时期的事情；向北的汉匈争战和汉匈和亲，汉武帝时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向东北经略朝鲜半岛，是从汉武帝时期设置乐浪四郡开始的；汉朝物产和汉文化大规模东传日本列岛，也是从汉武帝时期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四郡以后开始的；中南半岛设置交趾、九真和日南等汉朝三郡，也是在汉武帝时期。

汉王朝与汉文化走向世界的路线，实际上有很多条。向西有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向东北有辽东陆路和环黄海海上之路，往南有岭南陆路和南海海上之路。这些路线，在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王朝与汉文化走向世界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政治的、军事的、商贸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传播等。比如说，走向中亚、西亚最初是外交，后来演变成商贸和文化交流；走向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主要是争战、和亲、贸易以及人群移动；走向朝鲜半岛，北部是政治经略、设置郡县，南部主要是文化的交流和可能存在的商贸活动；走向日本列岛，主要是政治上的联系和文化的传播；走向中南半岛，东北部地区主要是政治经略、设置郡县，南部地区以及马来半岛，主要是文化的传播和商贸活动。

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对世界历史进程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亚、西亚，汉文化被当地所吸收；在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改变了当地的历史进程；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南半岛东北部，社会政治实现了从早期国家到郡县制的历史性跨越；在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对于当地从氏族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转折产生了“刺激、催化和加速的作用”。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的动因是什么？简单说来，就在于汉王朝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强盛，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化的高度发达，以及当时人们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胸怀和追求。两千多年前，世界上有两大帝国，即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汉朝，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朝是当时世界两极中的一极。同时，还有一个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胸怀，即“广地

万里”，“威德遍于四海”（《史记·大宛列传》）的气魄。

通过汉王朝与汉文化走向世界的考察，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历史启示：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国家的富强；要走向世界，更需要国家的强盛，同时还要有面向世界的胸怀和走向世界的气魄。

谢谢大家！

提问：

您好！就我所知，西域，西亚、中亚地区，不但出土了西汉的遗物，还有战国时期的山字镜。山字镜只有战国时代有。我推断这些山字镜产于战国时期，留存到了汉代，汉朝开始对外交流后把战国遗物传播到了那些地区。这个结论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日本地区也出土过战国中期的铁箭镞，战国时期不可能交流传播过去，我估计也是汉代时把战国遗物通过贸易渠道传播过去的。

白云翔：

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有一个前奏，也就是说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实际上先秦时期我国就和周边国家及地区发生了人员的交往和文化的交流。您说的山字镜，我还是主张是先秦时期传过去的，因为，目前在汉墓包括秦墓里，没有发现过山字纹镜，说明到了秦汉时期山字纹镜已经不再制作和使用了。另外，结合其他的考古发现来看，在战国晚期我国中原地区跟南西伯利亚地区已经发生了文化交流，这是没有问题的。

日本列岛发现的中国的文物，目前见到的最早的东西，可以早到公元前3世纪初，包括一些铁器残片和冲绳岛发现的战国明刀钱等，这些文物显然不是汉代传过去的，而是在先秦时期传过去的。

提问：

传统上我们认为是汉文化和汉文物有什么区别？如果进行清晰地剥离的话，您刚才谈到的大部分应该是汉文物，并不是汉文化。比如过去的一百年，中国人认为的西方的文化、文物对于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谈这个问题一定会论及今天我们所信仰的东西，比如源于西方的共产主义。过去两千年也好三千年也好，中国的文化对于世界是不是有更深层次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考古学的文物的层次？比如汉文化对周边区域的人们，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对他们的信

仰，对他们的哲学思想，有没有这种层面的影响？

白云翔：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讲到，文物跟文化不能等同，文物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的讲座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考察，因此，从考古学上解读，就只能主要从文物的角度和侧面来观察汉文化的对外影响。文物和文化不能等同，但文物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化的一个物质载体。

另外，限于时间关系，许多问题我们今天无法展开讨论，但我在讲各个区域的交流时强调，物品传播的同时是伴随着文化传播的。比如说有些地区仿照汉镜来制造铜镜，墓葬形态发生的变化，铁器文化、青铜器文化的传播问题等，这些都是从考古学上来论证的，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只讲物品的传播，而是想通过这些物品来说明当时汉文化的对外影响。比如朝鲜半岛的城的建设、丧葬文化的变化，包括陶器的制作等，都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发生的，只不过我们今天主要是从文物这个角度来看汉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提问：

您是否觉得现在的人们更关注于文物这一层面？咱们现在的学术也好，政治、文化也好，专注点是不是更倾向于唯文物论？

白云翔：

那不是。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如果我是搞文献史学的，那我就要从文献史学上来解读；但我是考古工作者，因此我就要从考古学角度来考察，那就离不开文物，当然也需要跟历史文献结合。

提问：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在讲座过程中，对文化传播的研究都是停留在文物层面，比如您反复谈到镜子，有没有别的切入点可以研究文化的传播？第二，汉朝和印度的关系如何？这一点讲座好像谈得很少。

白云翔：

我们不是停留在文物上，而是从文物出发来研究文化传播。因为是考古学解

读，就要拿实物资料来说话，因此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一些实物资料的解读。但是你应该能注意到，我的每一个小结，每一节的最后一部分，实际上强调的还是文化的传播问题，只不过是文物来说明问题。至于反复谈到镜子，是因为铜镜在各地都有不少发现。研究文化传播的切入点当然不止一个，而是有许多，比如从技术的角度、精神文化的角度、日常生活的角度等，但无论从哪个点切入，都需要有充分的资料作为依据。文献资料也好，实物资料也罢，没有必要的资料是无法进行研究的。

另外一个关于汉朝和印度的关系问题。从文献记载的某些线索来看，汉王朝和印度是应该有所联系的，但问题在于，目前中国发现的两汉时期的文物里没有明确的是印度来的东西；在印度发现的文物里，也没有明确的是汉王朝传过去的东西。因此我们说可能有联系，这个联系有可能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也就是从四川盆地往南到云贵高原，翻过云贵高原到印度去。目前在文献上和考古学上都有一些线索，但还都说不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讲，这是将来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西南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课题。



“汉王朝与汉文化走向世界的考古学解读”讲座现场

提问：

刚才您的讲座用很大的篇幅讲到了镜子或者是瓦当，没有对别的方面的研究吗？

白云翔：

考古学和文献史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研究受到材料的限制。比如讲到中亚和西亚，丝织品也发现过，但发掘的时候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漆器也有所发现，比如在阿富汗、叙利亚的城址和墓葬中曾发现漆器残片，但没有完整的资料；讲到蒙古高原汉匈交往的时候，讲到朝鲜半岛北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漆器、玉器等说话了，因为有这么方面的发现和材料。这就是所谓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只能基于目前能获得的材料去作讨论。有些文物在境外肯定是有的，比如丝织品应该会传到了日本，但是现在日本没有发现；在朝鲜半岛也没有见到正式发表的材料。今天的讲座我对铜镜介绍和讨论得比较多，因为各地铜镜的发现多，但我并不局限于铜镜，我现在更关注的是铜镜以外的东西，但资料实在有限。我现在正在尽可能地搜集其他方面的资料，但没有考古发现，也只能等待新的发现。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说“丝绸之路”当然是很好的，说“铜镜之路”是不是也可以呢？我看也可以。实际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需要各方面的材料。

提问：

铁器类的东西，有多大规模，才能炼出铁和制造东西？铜镜生产得比较好的，能不能照出人？

白云翔：

先说钢铁的问题。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西汉时期的钢铁产量是多少，现在掌握的材料还无法做出比较科学的推算，但我们可以确定西汉的钢铁工业当时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为什么？先是液态生铁，再由生铁冶炼成钢。生铁冶炼技术在西方是14世纪才有的，就钢铁技术和钢铁产量来说，当时中国是世界第一。我这里要澄清一个史实：电视剧《汉武帝》里讲汉匈作战，说汉人学匈奴做钢刀，完全是一种误说。实际上，当时匈奴采用的是块炼铁技术，他们的钢铁技术比西汉王朝差远了。

关于铜镜生产得好能不能照人的问题。当然能，而且照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见到的汉代铜镜大多是锈迹斑斑，很难照出人影来，但在当时，镜面是很光亮的。我这里顺便说一下秦汉青铜器的问题。有不少人认为，我国从公元前 800 年前后出现铁以后，青铜时代就结束了。其实不然。铁器时代到来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青铜器仍然很发达，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实际上很发达，只不过学界忽视了对它的研究，我给秦汉青铜器的定位是“最后的辉煌”。

提问：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当时的汉王朝和周边各个国家都是有交流的，这种交流有没有促进汉王朝以北的国度和汉王朝以南的地区的跨越汉王朝的交流？第二个是汉王朝的对外交流对当代中国来说有什么借鉴的意义在里面？

白云翔：

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也很关注。但是，目前从文献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记录，考古材料上也没有发现。我想不是跨越汉王朝，而是通过汉王朝。这种交流可能是有的，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即使有，这种交流也不太大。

第二个问题是汉王朝对外交流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启示。我们现在之所以下大力气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开头我们讲到的，过去长期以为汉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是我们引进来，实际上我们发现不是的，应该是走出去，这是一个学术背景；另外就是一个时代背景问题，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开放，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我刚才在讲座的最后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发展，就必须和世界发生联系，而走向世界最根本的是自身的强大、强盛、文化发达和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胸怀。因此，我们现在研究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对当今社会的启示或者说和现实社会的联系，那就是我们必须走向世界，而走向世界就必须发展我们的中国。只有国家强大了，文化高度发达了，你才能同世界交流，你才能走向世界。历史的启示就在于此。



作者小传

白云翔，1955 年生于山东淄博。1978 年 7 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

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副会长，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日本爱媛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客座研究员，2009 年当选为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先后从事田野考古、学术期刊编辑、考古研究和教学以及学术组织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考古、手工业考古、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等。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合著）、《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合著）、《中国初期青铜器文化の研究》日文版（合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合著）、《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合著）等。